

中亚、突厥族群对文化化学研究的意义

张 咏 徐海燕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中亚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突厥语族民族在这一区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回顾相关文化理论及对这一区域和族群文化的实证研究表明,人类文化的变迁是通过逐渐的“过渡段落”实现的,而中亚及突厥族群的文化进程为实现欧亚大陆的文明衔接与动态分布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中亚 ;突厥语族 ;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09)02-0024-05

Significance of Central Asia and Turk Ethnic Groups to Anthropology

ZHANG Yong XU Hai-yan

Abstract:Central Asia is located in the nuclear region of communication hinge of east and west and the Silk Road, where Turk ethnic group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rough reviewing correlative theories and demonstration research of this region and its ethnic groups culture, it is concluded that human culture change is realized by gradual “transitional steps”, and the culture process of Central Asia and Turki ethnic group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connection and dynamic distribution of Eurasia culture.

Key words: Central Asia;Turk ethnic groups;anthropology

中亚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应当指包括蒙古、俄罗斯南部西伯利亚、中国的新疆、前苏联的中亚五国以及阿富汗、伊朗部分地区,其中前苏联的中亚五国和中国的新疆又处于这一区域的核心地带。由于这一区域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不能不关注中亚,而文化交流不能离开文化主体——文化的承载者。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这些文化的承载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文化研究有什么启发?本文主要想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区域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为此,我们需要对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变迁进行回顾,然后看中亚及突厥语族文化对这一问题的启示。

一、文化变迁的再思考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命题。对于人类文化的变迁,古典进化论派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观点设计了三个基本的假设:(1)人类心理的一致性。即认为不论什么样的种族都具有同样的心理素质,或心理特征。(2)由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因而在相似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文化相似性。(3)既然在相似的情况下会出现相似性,那么,人类在从简单到复杂,或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时,大致也会经历一种相同顺序或相同路线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发展的相似性,或叫“平行发展”^[1]。与此相反,历史特殊论认为,人类文化只有各自完

收稿日期 2009-01-22

作者简介:张 咏(1970-),男,山东烟台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 文化人类学 博士,主要从事文化变迁与跨境民族研究。

徐海燕(1971-),女,新疆乌鲁木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助理研究员 国际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

全不同的发展轨迹,不存在共同的或者相似的发展规律。这样一来,时间只能是在不同文化中的独立展示,毫无通约性可言。尽管他们也认为民族学/人类学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坚持认为在未有充分的实证材料前是不能枉下结论的。其领军人物博厄斯(F.Boas)就曾指出,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似现象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甚至强调不同文化的发展方向都是特殊的,无法做比较,不同意有纵向性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共同进化规律。新进化论派的怀特(Leslie Alrin White)认为全世界各种文化都必定经历几个相同的阶段^[2],强调文化纵向发展的独立性或超有机体性,即特殊规律。“虽然怀特将这一观点应用于现实、有机、无机、超机体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进化过程’这一概念本身并未确定一个广泛的,现实运动的总体方向。”^[3]显然,他们在文化发展的时间问题上所持观点含有阶段性、一致性和独特性的特点,而人类作为文化动物,即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己文化和他文化的关系如何却被忽略了。

文化圈派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取向:一种认为世界文明只能从埃及产生,然后扩展到中东、欧洲再到地球其他地方,即所谓的“埃及中心论”;另一种则认为,整个人类文化史只是几个文化综合体在地球上移动的历史,是他们之间彼此机械结合的历史。因此,只要发现类似的文化特质,就可断定是文化传播和借用的结果。如果英国的施密斯(G·E·Smith)提出的“埃及中心论”成立,那么世界的文明只能由一个地方产生并扩散。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其它地方如果有人类活动,他们的“文明”在产生之前,这些地方的人类应该都是原始的、愚昧的,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接受外来的“文明”。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产生“文明”的地方的动力何在、以后如何发展?况且“文明”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地方传播出不同的样式?德国的施密特(Wilhelm. Schimdt)提出“连续标准”的概念,强调了文化在空间分布的阶段性,而文化在空间传递的连续性,或者说“中间地带的民族”对周边文化的反应如何,其行为是抽象的还是能动的并未加以说明。因此,播化与文化圈等学派的观点虽然可为我们提供某种思路,但就此下结论难免有些臆断,至少我们不能了解文化在空间分布的规律如何起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来看看中亚突厥语族民族文化的情况然后再对这一问题进行概括。

二、中亚、突厥语族民族文化的结构特点 文化变迁研究的启发

(一)中亚、突厥语族民族文化的结构分析

中亚的居民与民族很多,种族和语言不尽相同。从分布区域和影响来看,主要是操突厥语族的民族,以哈萨克族、吉尔吉斯和乌孜别克、维吾尔(Уйгур)等民族比较典型。可以从宗教行为、生计方式和语言、种族等方面考察。比如,从宗教层面讲,尽管同属突厥族群,由于在各自的民族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的文化变迁过程,因此,在不同的民族集团中,伊斯兰教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在这一进程中,一些群体由于从事定居农耕和商贸活动的增加,伊斯兰教伴随着军事征战逐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另一类族群集团由于坚持原有的游牧方式,逐水草而生,于是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将伊斯兰教与原有的信仰系统自然地结合起来,对于某种固定化的宗教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既按照伊斯兰教安排自己的精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依附于生态环境之上的生计方式的获得决定着某种信仰的“标准程度”。也按照原有的民间信仰安排自己的现实生活,从而完成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例如哈萨克化的转变。前者以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民族为代表,后者主要以哈萨克、吉尔吉斯(柯尔克孜)等民族为代表。对于哈萨克族来讲,由于生计方式的关系,在他们接受伊斯兰文明的过程中,对于清真寺的建立与否并无直接的必然性。而乌孜别克、维吾尔族聚集的农村、城镇、街道清真寺鳞次栉比,每村都有1-2座清真寺,每条街巷差不多都有一座或几座清真寺,这与哈萨克人形成了教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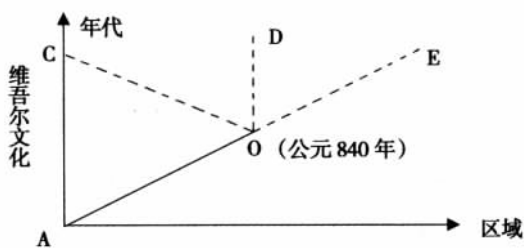
语言和种族方面也能体现出来类似特点。比如,在维吾尔和乌兹别克语中,来自波斯语的借词很多,普遍存在元音弱化现象,而在哈萨克和柯尔克孜语中保留了较多的突厥语成分,语音学意义上的元音弱化现象基本不存在;一些外来的借词与突厥语固有的词共同使用的现象并不少见,如“kix”与“adam”(人、人类,前为突厥固有,后为阿拉伯语借词)等语言学现象。如以体质人类学的观点看,世界人种在欧亚大陆的原生性分布也具有类似特点:即,这一区域显然为黄种(蒙古利亚人种)与白种(高加索人种)的混合分布地带,这一地带越往东,黄种人特点越强,往西则白种人特点为明显。比如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吐鲁番、哈密一带

的人与西边的维吾尔族在体质上整体上有种渐变
的特征。以上这些特点使我们合理地联想到,来自
东方漠北草原的不同游牧部落在与定居的农业文
明相遇时采取的不同态度。

上述情况表明,生计方式的改变是突厥民族
文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正是生计方式的改变,才
使得中亚、突厥民族的文化从内部发生了较大变
化。接受定居的农耕、商业文化的一部分突厥民族
与相对保持突厥民族原有的游牧传统的一部分突
厥民族在语言、种族及宗教实践等方面都产生了
较大变化。从而,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语言和宗
教文化等因素可以是突厥语族民族之间族际认同
的重要指标。

(二)中亚、突厥民族文化作为一种“过渡状
态”的文化形式对“文化变迁”的启示

从突厥语族民族的文化特点上看,突厥语族
民族的文化变迁是在众多文化基础上诞生和发展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东西文化或文明的汇集地。
另一方面,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以及
阿拉伯文明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相遇是在中亚得以
实现的,其完成形式便可以看作是突厥语族的文化
形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亚、突厥语族民族
文化在整体上还未实现文化学意义上的“均质
化”、“一致性”程度较高的水平,而是呈现出一种
“过渡性”的形貌特点。即,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在不



同的年代与区域留下各自不同的影响范围与分布
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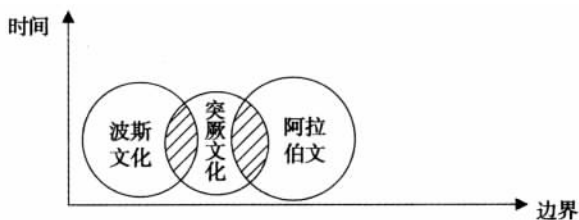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以下
几个侧面来考察某突厥语族文化(比如维吾尔文
化)“过渡性”的轨迹。

1.从历史分布轨迹看“过渡状态”

我们先假定这种分布轨迹是由一个个的“点”
构成的直线分布“面”:当AO构成维吾尔文化的历
史分布轨迹时,存在着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第一
种是积极作用力下的正态分布AOE,第二种是停
滞不前的AOD,第三种则是出现反作用力的非正

态分布AOC,即随着年代的变化,维吾尔文化的扩
散出现递减状况。不过,无论是何种状况,都要经
过AO公元840年回纥汗国解体这个关键的转折点,
只有经过公元840年回纥汗国(Уйхское ханство)的
解体、维吾尔先民的文化再组合与再适应才能完
成另一种文化模式的转化,现有模式只是具有相
对稳定性。

“渐变期”的观点使我们看到文化的发展并不
是一帆风顺的,其分布区域由于受到持续的“过
渡状态”影响,范围和方向也具有了多种可能性,
形成层层叠压的局面。例如中文里的不少汉字历史



上的读音和写法传到日本后,已被日本接受,虽然
有的与现代汉语的读音和意义已有较大的差异,
但谁都不能否认这些汉字是经过了整合
(интеграция)才被日本文化接受的。

2.从突厥语族文化结构看文化边界的形成与 文化接触与传播

“文化边界”指一种文化由中心向外传播与扩
散的界限,经常与他文化相遇。而接触到一定程
度,必然会引起彼此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历时角
度看,总会伴随边缘文化的产生。而在边缘文化
的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则出现不同的“过渡状态”。
从共时角度看,彼此关联、分属不同时期的“过
渡状态”内容和样式又构成了人类文化各自边缘
地段的空问排列和分布。正如下图所示,如果阿
拉伯文化的影响力大,说明其稳定性较强,对突厥
文化的吸引力越大,其边界则会分布到突厥文化
的很多区域;反之,如果波斯文化的影响力小,则
分布到突厥文化的区域就少;而处在不同“过渡
状态”的中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影响是不同的,
其稳定性若强,则受异文化干扰小,反之则受异
文化影响大。但无论如何,双方在边界与相邻地
段总会产生共同的阴影部分,表明了双方在时空
上既包括与他文化也包括与边缘文化的互动过
程。中亚突厥语族民族的文化结构的差异性特
征表明,他们的文化处在世界几大文明交汇之
处,形成了几大文明各自接触与传播的边缘地带。
通过这个边缘地带的中介,世界几大文明实现了
在空间的流动过程。

这样以来,中亚、突厥语族民族文化至少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给我们研究文化有启示:第一,文化变迁的“过渡性”特征。在文化变迁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规律和特点:即,一种文化的发展在年代和区域的排列与分布上往往会产生扩散的“区域”和“渐变期”,形成“过渡状态”,通过这个“过渡状态”,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得以组合与重构,如此往复。这种规律和特点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的“过渡性”,“过渡性”是文化变迁的本质特征。

第二,“过渡性的中介文化”连接“边缘”与“主流”构成了相邻文化的空间分布形态。一种稳定的文化模式只可能是相对地“稳定”,“过渡性”会打破这种“稳定性”,使其发展出新的样式,与相邻文化构成一种互补的“过渡性的中介文化”格局。“过渡状态”中存在积极的前进动力,也存在着消极的反作用力,双方彼消此长。没有“边缘文化”,该文化便没有持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没有“过渡状态”,该文化的发展便无法完成。“过渡状态”越短,说明其稳定性差而适应性越强,则边缘文化分布得可能更广,相反则分布受到限制。

第三,“过渡性的中介文化”状态内部普遍存在一种或以上文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文化形式和内容都是相对于另一种或者后面一种形式而存在的。因而在这个“过渡状态”内至少存在着两种以上的文化,而这些文化相对于周围的其它文化来说,又可以被认为是各自文化的边际地带,因而在这个地段内,文化特质由于运动的加剧,相对显得活力十足。而“过渡状态”文化的产生及发展方向是深受具有优势文化的影响,从而“每一后起的高级文化类型,都将比前一阶段的文化类型取得更为旷远和更为迅速的发展,乃至发展到今天^[4]。中亚突厥文化内部的差异性显示了这一区域和特定族群在世界文化史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在“过渡性的中介文化”内,一种文化的变化情况也可用定量(квантификация)的方法来表达,即:最大值、最小值和新增值。最大值是指继承和保留下来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现象,比如民族认同心理;最小值指那些曾经有过、但已完全丧失掉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现象,如中国汉族妇女裹足;而那些吸收的异文化或新增的文化内容及文化现象可以称其为新增值。

第四,从文化发生学角度看,文化存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二者缺一不可。缺乏时间的支持,

文化存在的空间区域难以维持;失去一定的空间,则文化在时间的分布很难成立。例如,中国汉族男子蓄辫子的习俗,只能追溯到清代,也仅仅只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从时间的意义看,不同文化的现实存在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连续空间分布,尽管我们可以从进化的顺序给予排列。出现时间的同在否定,只能代表我们知识生产体系的现实,并不能说明人类文化的真相与事实。

从空间意义看,文化的接触产生传播与扩散,而接触有赖于一定的文化群体的流动。理论上讲,文化群体间的非流动状态难以产生接触的可能性,扩散则难以成立。但实际上人类文化一直发生着接触,只不过有主动与被动、影响力大小等问题,否则文化变迁难以实现。正由于文化变迁,才出现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分布图景。中亚、突厥语族文化的出现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它使我们知晓,中亚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且还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即人类的文化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人类文化应当是从内部通过“过渡性”的本质特点,依靠一定的“中介文化”实现变迁和进步的。

实际上,在许多文化中都有对这一现象的象征性表达,如周星博士在有关桥与民俗的文化比较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他总结说,“神界(或阴间)一桥一出产、战争一桥一和平、天一桥一地、死一桥一生、彼岸世界一桥一此岸世界……”^[5]“桥”作为“过渡段落”的象征,连接了文化的前因和后果,承启了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范根内普(VAN GENNEP)在其《通过仪式》^[6]一书中提出的“分离——过渡——聚合”人生礼仪模式对此也给予了精彩的诠释。

作为几大文明交汇处,如果我们翻开汉语的古代文献对西域文化的记录,如《汉书·西域传》载,龟兹王绾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北史·高昌传》称高昌“周时城有十六,后至隋时,城有十八。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其风俗,政合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周书·异域使》载,高昌“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等等都能看到这一区域在文化上的“过渡性”特点与象征性表达。

如果美国生态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STEWARD)所谈“各地文化由于生态环

境的不同,导致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进化过程”这样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文化分布的多样性、变迁的过渡性与自然的、生态的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三、认识这一问题的意义

(一)坚持文化变迁的渐变性和过渡性

从具体某种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本身的传统如何被改造,依靠的是自身文化的基础,经过“过渡”阶段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然后再为下一个“过渡”阶段做准备。超越自身传统,或者说逾越各自特点强行进入一种“全新”的样式,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但在实践上则很难长久。因此,文化从个别现象上看,可能存在着暴风骤雨式的变革,但是从全局的角度看,循序渐进式的“过渡变迁”才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中介文化”为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存在提供可能

工业革命前,在世界文化分布上这种“中介的过渡状态”的特点较为明显,即:相邻的文化互为双方的“过渡状态”,离开此处“过渡状态”到达彼处、直接由此跨到第三方的“过渡状态”很难存在。由于各文化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上,从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财富。如同保护生物多样性一般,坚持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不仅仅具有科学的研究与运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其具有的伦理层面的意义。文化变迁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适当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应当由某种文化的拥有群体来最终做出决定。

(三)方法论层面

如果文化变迁的“过渡性”导致“过渡段落”的出现,那么,“过渡段落”必然产生边界,认识一种事物或现象如果从时间与空间的边界入手显然是可行的。台湾学者王明珂在其《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书中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身处文化的核心地带很难知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只有身处边缘地带,进行深刻的比较,才有可能认知一种文化。

(四)重新认识中亚、突厥语族民族文化的意义

中亚、突厥语族文化让我们认识到,人类文化之间自古就有某种联系的,这种联系是通过某些

“中介文化”实现的,文化的变迁与进步也正是通过文化的传播与扩散逐渐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亚和突厥语族民族作为世界几大文明的汇集处和承载者实现了人类文明在空间的流动过程,缺乏这样一个前提,世界几大文明的接触和传播是难以实现的,世界文明史可能将会改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亚、突厥语族民族的价值才凸现出来。而以往的研究对这一问题还研究的很不够,我们更多知道的是某个文明如何,至于文明之间是如何在空间流动以及传播形式等问题往往忽视了。从另一方面讲,面对多种文化类型的挑战,游牧文明本质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可以使其在遭遇文化变迁时拥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当今世界,西方以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大优势引导着国际化、全球化的潮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不使自己被“边缘化”(маргинальность)急切盼望与世界接轨,一时间英语铺天盖地、“国际标准”不绝于耳,似乎人类文化的同质性在加强。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对自己的传统是全盘西化,还是因地制宜?所幸的是,在与西方的较量中,非西方找到“本土化”的概念。同时,我们也应当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文化选择与他人的文化选择正是借助于一种内在的互动机制(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形成了彼此的生存空间,构成了人类文化无限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石奕龙.应用人类学[M].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93-96.
-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60.
- [3][4]美]托马斯.文化与进化[M].韩建军,商戈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6.
- [5]周星.境界与象征:桥和民俗[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48.
- [6]JEN GENNEP, LES RITES DE PASSAGE, EMILE NOURRE, 1909.1960年被译成英文,书名为“THE RITES OF PASSAGE”,在英国伦敦出版.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周振兴]